

晉北抗戰的第八路軍

校閱者序

民國廿七年四月中，香港立報發刊不久的時候，我遇見了倫敦先驅日報記者傑姆斯貝特蘭先生，在一個聚餐會席上。聽了他在席間所作的簡短的關於八路軍在晉北作戰的報告，並看了他帶來的一些照片之後，覺得我應該和他再談一次，因為那時候晉北抗戰的消息對我們太隔膜了，於是在香港酒店，我們又有了一度單獨談話的機會。他在聽了我告訴他，晉北抗戰真象所以不能傳達給大眾的種種緣因後，遂決定把他正在寫作中的一部著作裏，已完成的關於晉北抗戰的部分，交給我譯出發表。他說晉北的抗戰，是許多寶貴教訓，中國應該接受並據為改進一切的張本。因此他願意他的著作未用英文發表之前，先把這一部晉北抗戰的紀錄，用中文印行獻給中國的大眾作參考。

貝特蘭先生對我們的熱愛，深深的感動了我，於是立即應允下來擔任這翻譯工

作。這個工作的承允，實在是不自量力的承允，因為我那時在香港立報是一個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勞工，要辦全報館的事務，要編「小茶館副刊」，在「小茶館」中每天至少要寫兩篇文章，同時每天還要寫一篇社評。我原希望再每天犧牲一兩小時的睡眠來完成這義不容辭的任務，但是試行之後，證明精力不夠，於是決心另找一個朋友翻譯而由自己來校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幾個友人之後，居然得到了方瓊鳳先生來担任翻譯。他翻譯的非常快，每天至少譯就一章，多時甚至是每天三章，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書卅章即已譯就。但是他開始工作的那個月，是各種可紀念的日子最多的五月，我爲了向香港讀者介紹每一個紀念日的意義，幾乎是一個人每天要寫一版副刊上的文字，深夜回到家裏，往往飯吃不到一半（我的晚飯到深夜一二時才吃是常有的事），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所以我只能每天利用由九龍過香港，在渡輪上的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來校讀他的譯稿，以致直到九月半，我決定脫離香港立報到新疆去的時候，卅節譯稿，才只看完了三分之一。爲了一定要自己負

責把牠作完，就帶着他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在港梧輪中，在由衡陽到漢口的火車上，在飛機裏都未放下這工作，甚至在迪化留居的四十日內，一有空閒，也立刻拿出這譯稿來看幾段，不過我畢竟是太忙了，所以雖然時刻不忘此事，但這卅章譯稿的看完，還是在由迪化又飛回香港後才實現的。

現在貝特蘭先生的英文本已經出版了，在他爲這本譯本特別寫的一篇序裏提到的「先出中文譯本」一語，只成了我個人「輕諾寡信」罪狀的紀錄，而對於方瓊鳳先生，我當時是那樣希望他迅速趕譯，而在他急忙把全書譯就之後，那原稿却在我的手裏蟄伏了五個月，也是我應十二萬分向他抱歉的。

貝特蘭先生在臨離香港時，曾告訴我這本書出版時他希望在扉頁上題一句獻詞，把這本書送給宋慶齡先生，不過他臨行匆匆未及徵求他的同意，要我代爲徵詢。當我託一個朋友去問宋先生的時候，她說這本書應該獻給游擊隊的母親趙老太太，我同意她的主張，所以這本書扉頁上印上了趙老太太的照片和簽名，但這件事並未

寫信徵得貝特蘭先生的同意，我應該在這裏聲明一下。

至於這本書的內容，我不想多說什麼話，作者特爲本書作的序言就等於是這本書寫作主旨的一個說明，讀者讀後自可領會一切。不過這書有幾個特點是我應該爲他指出的，就是這本書在觀點上比類似的許多外國記者所寫的報告文字都正確，他寫作的目的是在加強中國統一戰綫的力量，他「並沒有抹煞在前線上爲國忠勇奮鬥的士兵們的豐功偉業，只來誇讚中國一支軍隊的意思」，他指出山西省的弱點，和八路軍的優點，是希望大家學習那可以戰勝敵人的戰術與戰略。他對郝夢齡的陣亡提了好幾次，就是他並不獨厚於八路軍的旁證，至於在英文的文字上講，也寫的比較優美。還有這本書是寫於西行漫記出版之後，作者對於斯諾已經詳細寫過的材料完全從略，而於斯諾未寫過的材料則特別加詳，像關於賀龍的記述就是一例。所以這本書可以把牠當作西行漫記的姊妹篇看，並且爲了寫作的時間較近，他比西行漫記給了我們許多更新的寶貴材料。如果西行漫記可以看作八路軍在抗戰前的史乘，

那麼這本書就可以看作八路軍抗戰史的一頁，所以若說一九三八年的第一部好書是西行漫記，那麼我至少可以推荐這本書爲一九三九年的好書中之一部。

最後我願說幾句關於貝特蘭先生個人的話，他是牛津出身的學生，蘇格蘭人，英國工黨的黨員，年輕，能夠吃苦耐勞，誠樸的性格，愛真理正義的熱忱，叫人一見他的面，就可以感覺到。他在日本住的很久，所以他懂得日本侵略中國並不是日本民衆的意志，而中國的抗戰，也正是爲解放日本勞苦大眾而戰。他現在大約在倫敦，曾允許今年再到中國來，我希望這本譯本出版時，這個真正的中國友人，又踏上了我們的國土。

有幾個友人我必須在這裏向他們致謝，那就是P和L，在完成這工作上，我得到了他們不少的幫助；還有金端蒼女士爲本書畫了一幅說明著者旅程的地圖。

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於香港。

作者自序

以下這幾章集成一本書的文字，是我在華北前線上，和一部份中國兵士過了一個冬天的非正式記錄。爲了一些朋友的慫恿，我預備把這些材料在中國出版，並請方瓊鳳女士担任把牠繙譯成中文。

一個外國記者在把他的文章用英文發表之前先來出版一本中文譯本，這似乎是不常見的。爲了這，我想在未說一切話之前，先來講幾句此書是怎樣寫成的經過。

當我在一九三六年初次來到中國，預備在北平某大學研究一年學問的時候，我沒有想到這一年會是進到現代中國歷史中一個內部有極嚴重變化的一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共兩黨十年鬥爭的大清算，立刻被外國的觀察家認爲是從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使中國統一的最大步驟。

不過，所有中國的朋友們，雖然對於那從西安事變的熔爐中提鍊出來的新的統

一表示歡忻，可是他們中間已有許多人察覺未來的危機已伏在前面。只要中國仍舊是四分五裂，或者是中國人還不斷的和中國人自相殘殺，日本帝國主義者——他們是早已把完全征服中國這件事當做目標的——對於他們那漸進的經濟侵略政策是相當滿足的，但不幸中國竟統一起來了，日本軍閥一向最覺得担心的恐懼，現在已經被他們自己意識到了。

中國會很快的變成一個不易被人征服的強國了。日本軍閥們於是互相討論着，最好還是立刻動手，這次動手非給中國一個致命傷不可。

因此在日本軍閥利用蘆溝橋事變作為侵華之導火線以前，只有六個月的時間給中國人去團結一個全國抗戰的統一戰線。而現在他們起來抵抗的是一個作了長時間準備攻的擊。

就整個日本人民來說，他們是不願意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和中國發生戰事的。蘆溝橋事變掀起時，我正好住在東京，當戰事爆發的消息最初傳到日本民間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他們都是那樣憂慮，那樣驚慌。不過，日本現在是一些法西斯軍閥團體實際獨裁下的國家，這些團體整個統制了日本國內所有的新聞紙、無線電及其他的宣傳工具。

在日本，對於侵略中國這件事，是不容許有任何反對的呼聲的。代替這個的是我們在那個七月裏，目擊日本人在含着驚恐的旁觀下，順從了少數想藉這戰爭與掠奪中國土地而得到福利的統制者之冷酷的要求，使日本全國捲入戰爭的漩渦去了。

在北平被圍以前，我正好趕回華北，進了北平城。在那舊都的城牆裏面，我第一次看見了在北方的中國人的怯懦因循最不爭氣的抵抗。這給了所有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的人們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從這個一開戰就敗退的經驗上，中國人却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教訓。

北方的崩潰，把存在中國人抵抗力裏面的弱點完全公諸世界了。第一是軍事上

的弱點和軍事策略上的錯誤，宋哲元將軍在這華北第一次和敵人作戰中，對部隊的支配之太缺乏眼光，是不可饒恕的。爲了軍隊支配的不適當，使抗戰的士卒無端犧牲了不少性命，這代價是付的太大了。

但還有比這軍事上的腐敗更糟的事，那就是在政治上的弱點；一方對於中央政府缺乏合作精神，而地方當局又沒有好好把民衆組織，武裝起來，去保護他們的家鄉。就我個人在北平所得的一點經驗來講，我覺得中國非做到以下兩件事，無法使抗戰成功，至于說勝利，不做到下列二事，那就更說不上了。這兩件事是什麼呢？就是（一）中國能實現真正的政治上的統一，（二）這次抗戰必須是全民抗戰而非只是政府或軍隊的抗戰。

一直到上海和南京都陷入敵手，中國政府對於這些教訓才算是真正領會到了。在北平失守以後，我的腦子裏只有一個觀念。就是我得離開那爲我所愛戀過的古城——它已非中國所有了——而到別的省分去，親眼看看那裏的中國人民對於這

出其不意的外來侵略，有一種什麼樣子的反應。

但是我往那裏去呢？這時日本侵略者正在企圖擴大上海戰事。他們很明顯的要使中國把他們的精銳軍隊和技術資源完全集中在這個區域來，另一方面，日本軍却在華北拚命的進攻。那時我知道大多數的外國新聞記者都齊集於南京上海，對於預測京滬要發生事變的觀察者，我們是一點不感到缺乏的。並且我個人仍舊相信日本當前的作戰目標還是華北，而中國人能在華北繼續不斷的抗戰，倒是國防上最重要的策略。

在北方，還有一件事足使外國人感到興趣的，那就是奉蔣介石委員長命令重新組織起來的第八路軍已迅速動員趕赴抗日前綫。在這個舉國一致抗日的戰爭裏面，中國的紅軍將要佔一個什麼地位呢？

自從斯諾的「西行漫記」(Edgar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以來，中外許多人士對於這從全國十二個行省中集攏來的工農軍隊的組織與歷史，開始認識得

比以前清楚了。但是這故事要讓它能趕上時代。在這新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將怎樣行動呢？以他們輕兵器的實力，怎樣才能有效的去和日本強有力的飛機大炮對抗呢？

爲了要給這些問題尋求一個解答，我向西安進發了。從那裏費盡千辛萬苦才來到曾經爲「紅色的中國」做首都現在是特別邊區省會的延安。我和共產黨的領袖談過話，從毛澤東那裏，我知道了共產黨正在進行着全國合作的新計劃。同時我又從他那裏得到了許可，以一個外國記者的身份，隨八路軍到前綫去。

自此以後三個月中，我所得的印象與經驗，都寫在後面各頁中。在山西瀾漫着雪花的山谷裏面，我曾分別和八路軍各隊的人們一齊旅行，有時走路，有時騎馬，有時乘的是軍用汽車。雖然我沒有分担這些抗日作戰者所受的顛連困苦——因爲我知道當他們有一點好東西吃的時候，我總是吃那最好的；而我身上所穿的是一件皮大衣，兵士們却有許多連冬天的棉襖都沒有——但是在我一方面，我也可以說受盡

了一個外國人所能忍受的一切，和這「民衆的軍隊」共同過了一陣共同的生活。這真是一件令人興奮難忘的事情。不過，我得預先在此聲明，我絕無抹煞其他在前綫上爲國忠勇奮鬥的士兵們的豐功偉業，只來誇讚中國一支軍隊的意思。這些文章原來是爲倫敦先驅日報(London Daily Herald)寫的一些特約通訊，現在把他們收成一冊，其中內容，當我最初寫的時候，有些是在比較舒服的總指揮部裏，有些是在山西的各小村莊裏，在那裏的鄉下人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外國人，尤其是對於我用的打字機這件東西，覺得驚奇新穎。總括來說，這些文章只是我現在正在從事寫作一本較長的書裏的一部份，這本要寫完的書包括的範圍比較廣泛，對於中國北方抗敵的整個戰場都要加以述敘。

至于我此刻提前發表這一部分的緣故，是因爲我相信對於那些在中國沒有其他機會看到這種材料的人，一定會使他們感到興趣。從這裏面，大家所得到的是一個同情中國的新聞記者，又是英國工黨黨員，並一向絕對擁護反對法西斯主義與帝國

主義戰爭的統一戰綫信條者的觀點。

甚至在以前那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們，當此國家瀕於危亡的時機，對於共產黨人已經明白表示爲國家犧牲與忠誠的決心，也不再加以懷疑。假若這本書能帮助大家捐除誤會，而加強全國統一戰綫的話，那麼此書的問世，就不能說是沒益的事了。

現在該輪到我來向那些使我的陝北旅行能夠成爲事實的朋友們致謝了——我要特別道謝的是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第一百二十師師長賀龍將軍。此外那些幫助我收集材料的人名，實不勝枚舉，但我必得在此提出——雖不便說出他的真姓名來——那位從北平去的學生朋友，他和我一同到前線，當我那說不完全的中國話不能使我達意時，總是靠他替我翻譯。對於他，我是不能憑這麼短的一行字來表示我的謝忱的。

我是在那指揮侵略中國的國度裏的首都寫這篇序文的。寫的這天正好是世界上

所有的工人們——公開的或祕密的——遊行示威，反對法西斯主義與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者的一個日子。這天清早，在車站上我看見了一批應徵開往中國去的日本後備兵，他們正在向家人朋友告別。在那裏沒有發狂的熱心，沒有出自心底的效忠的表示，所看見的只是一種無邊的憂愁，一個緊貼在那些悵鬱的人們心上的壓迫。

日本民衆是在想把這戰爭忘掉，可是日本的軍閥却仍在使這戰爭繼續進行，要等到把他們國家的血汗一滴滴絞盡才肯罷手。日本民衆對於他們的統治者領導他們往這樣一條貪得無厭的血路上走的情形，還能容忍多少時候呢？

這問題的解答，是要靠中國人自己——同時也要看已經捲起的中國民衆的狂潮來決定的。給這問題的解答，是從最後的極端困難中掙扎出來的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只有等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完全被傾覆之後，中國才能自由與獨立，也只有等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完全被傾覆之後，日本民衆本身才能得到解放。

傑姆斯·貝特蘭，一五月九三八年一日於東京。



們士戰的勇英軍路八第



(上)第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

賀龍(右)及副師長蕭克

(左)

(左)第三五九旅旅長王振。

(下)三五九旅參謀長劉子齊。



在前進中的第八路軍

(上) 八路軍一士兵在黃河邊前進。



(中) 晋北八路軍乘馬渡河情形。



(下) 在晋北雪地行軍的第八路軍。

